

# 国家视野下的地方史书写

## ——《庆阳通史》评介

□尚季芳

摘要：三卷本《庆阳通史》的出版，标志着甘肃地方史的研究和书写走上了一个新高度，它是政府和学界良好合作互动的产物。该通史集众家之力，通古今之变，站在国家视野下审视地方历史，新意迭见。全书史料丰富、论证精准，视野宏阔，多重范式交替使用、研究方法多样，学术性强，堪称地方史研究的典范之作。虽然对某些问题研究不够，诸如庆阳历史发展的动力、发展的特点等，但总体上该通史是成功的，是一部质量上乘、学术品位和社会价值俱佳的著作。

关键词：《庆阳通史》；国家视野

作者简介：尚季芳（1976—），男，甘肃张家川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副教授，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区域经济与社会。

《庆阳通史》编修工作于2007年7月启动，历时4年，于2011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它是由庆阳市委、市政府牵头，市政协策划、组织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该书上溯远古，下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间跨度长，涉及面宽。全面系统记录了几千年来庆阳历史发展动态的变迁过程，展现了庆阳历史文化的深厚内涵。全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远古至隋唐五代，中卷宋元明清，下卷民国），共20章，180多万字。

纵观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 一、视野宏阔 学术价值凸显

庆阳位于中国大西北，甘肃省的东部，北与宁夏接壤，东与陕西毗邻，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加之富庶的资源 and 重要的地理位置，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历代征战西北，必先控扼庆阳。延至近代，庆阳又成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之一，为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孕育了无数革命先烈，为创建新中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下，庆阳发展如火如荼，蒸蒸日上，举世瞩目。在盛世修史的情势下，《庆阳通史》问世，这是甘肃省第一部地方通史，它不仅是庆阳历史上一件大事，也是甘肃、西北乃至全国地方史研究和撰写的一桩盛事。

然而如何将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庆阳史通过文字比较完整地表现出来，既能体现宏大叙事，又能作绣花针的功夫，进行细致考证，这是撰写者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庆阳通史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跳出庆阳，立足全国乃至世界，在国家视野下考量长时段、中时段及短时段的庆阳历史。这种大历史的视野使得所指涉和研究的问题显示出前所未有的价值，真正体现了后记中提出的要求作者“站在国家史的高度撰写庆阳历史，力求实事求是地反映庆阳在中国、在西北、在甘肃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实事求是地写出庆阳的历史特色、地域特点和各个历史时代的时代特征”（后记第1780页）。全书每个章节都将这种思想贯穿始终。如汉匈战争中的北地籍将士、庆阳大族与魏晋南北朝政治、宋金战争中的庆阳籍将领，明清庆阳士人的从政风格与个性特征、庆阳在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博弈中所扮演的角色、庆阳在维护中央政府统治的合法性方面所作的贡献，庆阳在民国时期的社会现代化水准、庆阳在陕甘宁边区中的地位及其在新中国建立过程中的奠基作用，等等。通过这些书写，充分彰显了庆阳在中国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不可替代性，既丰富了庆阳历史内涵，也充实了国史的研究视阈。

## 二、史料丰富 论断准确

史料作为史学研究的中介，是史学的生命，是历史重建工程必需的原材料，这里没有先验的预设，一切都是依据史料得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本书在史料的搜集上不遗余力，孜孜以求，所采用的史料种类繁多，数量可观。除了传统的二十四史等正史外，还利用了档案、报刊、地方志、文集、奏议、实录、全集、选集、回忆录、日记、年谱、民歌、碑刻、图片和考察报告等大量第一手资料，参考了400余种已有论著，将迄今有关庆阳的历史资料和研究文献基本一网打尽。诚如绪论中所说：该书“在庆阳历史资料的挖掘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绪论第27页）。抑有进者，有些材料第一次纳入到本通史研究当中，如民国时期的档案、报刊、政府公报、日记、社会调查和回忆录等；清代惠登甲的《庆防纪略》和胡庭奎的《续庆防纪略》；外国考察家布鲁斯的《走出西域——沿着马可·波罗足迹旅行》、克拉克的《穿越陕甘：1908—1909年克拉克考察队华北行纪》和古伟瀛的《塞外传教史》等著作。难能可贵的是，通史还对一些未刊硕博学位论文也作了利用，搜集资料之详细，于此可见。总之，以上资料的应用，不仅对以往研究中的一些讹误进行了纠正，并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开拓提升，“这不仅使本书的研究持论有据，也极大地丰富了庆阳历史的内容”（绪论第27页）。在运用资料上，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充分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每有引用必有交代。这种严谨求实的撰写态度，值得效法。

对一些史料不足、存在争议的问题，要么存而不论，留待来者。如对庆阳各县商会的研究，作者诚恳地指出：“关于各县商会活动，现有文献记载很少，有待于进一步挖掘资料和研究。”要么在充分列举学术界的观点后，作重点研究，给出自己的解读。如对鹮的地望问题，有陕西旬邑、彬县说，有甘肃宁县说，有山西说，通史作者经过认真研究，认为“鹮地在今泾水流经的陕甘交界地区，包括今甘肃宁县、正宁县和陕西旬邑县、长武、彬县等地”（上卷第117页），该论断准确可靠。长期以来，对明代庆阳籍文学家李梦阳文学思想的研究，学术界褒贬不一，甚至对其持否定态度，指责他的“复古”是“拟古”，把他置于李贽、汤显祖等为代表的晚明新文学的对立面，而《通史》则把李梦阳的文艺思想与诗歌创作结合起来看作是一个以尚情贵真为中心的整体，认为李梦阳对“存天理、灭人欲”

这一理学根本信念进行了批评，提出了“理欲同行”的理论，他的文学理论以真情为核心，与晚明文学思潮是相通的，李贽、袁宏道等人对李梦阳推崇备至，把他看作一位先驱者。因此，“对明代中叶以后诸如李开先、袁宏道、冯梦龙等重视民间通俗文艺的作家确乎产生较深刻的影响”（中卷第987页），此论颇为中肯。

### 三、研究段位高 创新点多

与以往的诸多庆阳历史论著相比，该通史显然在研究的段位上大大提升。该书的几位主笔都是研究庆阳历史、陕甘宁边区和西北社会经济史方面的专家，他们有关上述领域的研究成果已在国家级出版社出版，或发表于高级别的刊物，得到学术界同仁的赞誉。故庆阳历史上凡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他们都能给以更加翔实、合理、客观和多元的解释。而对一些曾经未加关注或关注不够的历史，作者则见微知著，深刻挖掘，尽可能地展现其价值和意义。事实上，庆阳历史上一直是中原王朝的边疆地区或近边地区，在中原王朝处理与少数民族关系的活动中，庆阳地位显要，起到重要的中介和衔接作用，同时汉民族和少数民族的文化在这里交织汇通、迁延变动，其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形态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三卷本庆阳通史尤其是上卷和中卷都将此特点体现得非常充分。如岐黄之术的源头，义渠戎国与秦国的关系，北地、安定郡的内迁，北地傅氏与魏晋南北朝政治，唐蕃在陇东的争夺，熙宁以后庆阳的宋夏争战，北宋管理蕃族的措施，宋金战争中庆阳籍将领，庆靖王就藩，三边总制管辖体系与庆阳防卫，董福祥与环庆流民军抗清降清的活动，庆阳的新政，庆阳会党起义等，做到了既见树木，又见森林，不仅看到了历史，且看透了历史。下卷对民国北洋政府时期庆阳社会、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庆阳社会以及陕甘宁边区社会都作了深度阐释，既是三卷本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可以独立成篇，单独成文，对短短38年的历史作了精深研究，范围广阔、内容宏富。如1912年至1928年的庆阳人口、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庆阳的政权体系、国民党在庆阳各县党部的建立、保甲制度的实施，20世纪20—30年代的庆阳商会，抗战时期庆阳人口与人口流动、妇女社会地位，1937—1949年国统区的农业和工商业以及国统区的农贷、田赋、摊派及灾荒，1912—1949年的庆阳文化中对慕寿祺评价和《甘宁青史略》的学术价值的分析，都极显功力和学术眼光。应该说，上面提到的各个问题，大多数内容首次纳入研究者的视野，并给予了多向度的逻辑分析，创新之处多，令人耳目一新。

### 四、研究范式转换 研究方法多样

近年来，学术范式的转移是学界讨论的热点，一些新范式纷至沓来，令人应接不暇。诸如全球化范式、文明史范式、近代化范式、整体史范式等。这些新范式的出现，一方面是史学自身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经济发展对史学提出的新任务，史学只有因应时代，才能跨出封闭的世界，获得生命力。纵观《庆阳通史》，撰写者在范式的运用上娴熟自如，打破了过去阶级斗争范式一统历史书写的主旋律。从远古到1840年的庆阳历史，作者将文明史范式运用其中，多种文明在这里的交汇、斗争、融合，形成了庆阳复杂多维的地域特色。1840年直至1949年，中国卷入了全球化的序列当中，西方文明对中国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诚“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僻处西北的庆阳同样遭遇了亘古未有的冲击，虽然迟缓，但裂变却是必然的，庆阳社会逐渐走上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轨

迹，社会各层面出现了近代化的迹象。因此，站在国家视野下撰写的《庆阳通史》，自然更能贴近全球化和近代化范式。的确，在这 109 年的庆阳历史里，作者站在新的视角，举凡工业、农业、电讯和交通等经济领域里的新生事物都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对政权演变、政党斗争和意识形态等问题也作了深入考究。总之，研究范式的转换，把《庆阳通史》的学术价值和现实价值提高到了新的高度。

论及研究方法，《庆阳通史》中也体现出了撰写者的学术慧眼。大体言之，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阈在该书中作到了充分展示。如环境史，环境是人类生存的根基，对地域文化的形成至关重要，该书在这方面匠心独用，建树颇多。如上卷第一章自然环境与地理因素，尤其该章第二节有关秦汉以来自然环境的变迁等问题的考量；中卷第七章第四节，第九章第三节，第十章第三节、第七节，对北宋、明清生态环境的叙述。这些描述，虽然文字不多，但它成为庆阳生态史研究的肇端。再如人口史，各章节都有论述，要么单列一节，要么夹杂与其他论证当中，详略得当。值得提及的是下卷第十二章第三节中的 1912 年至 1928 年的庆阳人口，第十七章第七节中的人口与人口流动，第十八章第四节国统区的人口，第十九章第四节解放战争时期庆阳人口。基于资料的丰富，作者将民国时期庆阳的人口数字统计极为详尽，使读者一目了然。如将各章节组合成文，不失为一部庆阳人口史的文本，使我们从人口维度去看庆阳历史的播迁演化。其他诸如民族史、宗族史、灾荒史、妇女史和风俗史等都有所论述，新意迭见。当然，该书在研究方法上，还运用了阶级分析方法、比较史学方法、计量史学方法和心态史学方法等，这种多取向研究和撰写路径，使得《庆阳通史》更为丰满，更富时代气息。

历史是史学工作者对客观事实的永恒认识过程，在此，客观事实发生于既往，不可复原，然而史学工作者却受到了自身资质、社会环境和资料中介等种种因素的制约，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不够全面。因此，任何史学认识都是相对的，认识的都是相对真理，没有一劳永逸、毕其功于一役的历史研究。以此而言，《庆阳通史》虽然是当代学者站在时代制高点上，对庆阳历史的一次全面梳理和总结，但其不可避免受上述多重因素的桎梏，换言之，它只是当代学者认识庆阳历史的一个阶段，它不可能穷尽庆阳历史的每一个细节，也不可能对每一个问题都有精当的透视。

这里笔者求全责备，提出少许看法，以就教于著者。前已述及，社会史研究取向成为该书的一大优势，然而，8 社会史最关注底层社会的历史，关注民众日常生活的历史。从远古到民国，庆阳民众的日常生活该如何体现，某种程度上，他们的行为举止决定了庆阳历史的走向。读完通史，这样的历史描述很是不足，不过要作这方面的探究，不是轻而易举之事，希望留待来者。其次，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地方基层政权研究不够。众所周知，中央政令在地方推行的彻底与否、在地方的实施效果如何，需要地方基层政权的执行和运作，地方基层政权的稳固与否是国家繁盛与衰败的表征。因此，一部地方性通史理应对此问题作比较彻底的交代，方显该地方在国家事务中的地位。本书除在下卷对国民党的基层政权和陕甘宁边区时期的基层社会有所阐述外，在上卷和中卷基本未有涉及。再次，对历代庆阳社会变迁的动力未作深入探析。撰写地方性通史，这是需要十分注重的。如古代庆阳到底如何变迁？变迁的模式是什么？是什么促使庆阳社会在发展？古代庆阳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这些先导性的问题必须要始终贯穿于整个写作当中。延至近代，庆阳社会的发展又呈现出哪些不同于古代的特点？庆阳社会的近代化轨迹又受到了哪些因素的推动？窃

以为除了中央政府、甘肃省政府对庆阳的开发经营外，至少还要关注传教士与庆阳社会的变动（中卷虽然有清末洋教传入一章，但对洋教传入后与庆阳社会的变动分析不够），旅外甘肃人、西北人与庆阳社会之关系，国内外知名人士对庆阳的考察与治理（中卷虽然有左宗棠对庆阳的治理与开发，但是否还有其他人，都需一一交代），庆阳近代社会变动对整个甘肃省乃至西北地区的影响如何？等等。最后，一部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的通史，应该精益求精，臻于完善，因此必须注意标点及错别字的校正。这方面，通史尽管几易其稿，精于校勘，但还存在一些细小问题。诚然，一部大部头的著作里出现编校差错在所难免。

总体上，《庆阳通史》是一部质量上乘、学术品位和现实关照俱佳的作品，值得地方政府和学术同仁参考研读。

## The Writing of Local History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A book View on The General History of Qingyang

Shang Jifang

**Abstract:** As the outgrowth of good cooperation of government and educational circles , The General History of Qingyang is indicating that the writing of Gansu local history achieves a new height.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 with rich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many kinds of research methods , the book has lots of new ideas. Though it is inadequate to the motive force of Qingyang history development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 the general history is still successful. We can take it as the model of local history research.

**Keywords:** The General History of Qingyang;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 责任编辑 薛正昌)